



论区域国别学视域下“区域”的形成与历史演变

黄民兴,吴月

(西北大学 区域国别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摘要:本文首先对与“区域”概念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主体划分了“区域”概念历史演变的阶段,并分析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这些阶段包括:远古部落和部落联盟时代,即没有国家的“部落区域”;城邦时代,即小国林立的“文化-经济区域”;文明多元的有限君主制王朝时代,即区域与国家的重合;文明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时代,即“文明区域”的形成;欧美殖民宗主国主导下的区域时代,即“殖民区域”(殖民帝国)的形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殖民“区域”与独立“区域”的较量;冷战时代,即不同意识形态的“区域”对立;后冷战时代,即全球化起伏形势下的“区域”多元化。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区域;世界;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C01,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25-06-005

近年来,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如火如荼,有关著述不断出版,相关讨论也十分热烈,有关“区域”和“国别”的概念辨析即为其中一个方面,这里首先来看一下西方学者有关“区域”概念的定义。在西方学术界,有关“区域”的概念众说纷纭^①。多数作者同意“区域”包括特定的地理接近性和邻里关系^[1]及相互联系^[2],而也有学者强调“区域”有一定的文化同质性^[3]或社区意识^[4],属于特定群体与特定空间之间的文化关系复合体^[5]。罗伊·马克瑞迪斯(Roy Macridis)提出“区域”包括五个操作性标准:价值与文化的互动;地理上的相近性;经济关系;权力关系与权力团体之间的政治互动;战略上的考虑^[2]。国际关系学界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则提出,从国际关系的主流观点看,“区域”是一个地理上聚集的国家子系统,其内部结构和进程方面的独特性使其区别于它所属的更广泛的国际体系或社会;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出发,英联邦、小岛屿国家联盟、“第三世界”和亚太经合组织都不能被

收稿日期:2025-08-10。

^①下文只在注释中说明观点提出人姓名的动态介绍主要参考:D. Vukovic and D. M. Kochetkov:“Defining Region”, *Regional Studies*, Vol. 3, Issue 2, 2017, pp. 78-79.

^②Roy Macridis and Richard Cox.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3, 1953, pp. 641-657. 转引自陈家喜《地区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革新》,载于《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第85页。

称为一个区域;如果组成国际体系的政治单位(如前现代世界的“野蛮”部落)本身是流动的,区域也不可能存在^{[6][22-23]}。但也有不同观点,亨利·基辛格(Herry Kissinger)^[7]和希拉·佩格(Sheila Page)^[8]都把包括亚太经合组织在内的地区组织算作“区域”。此外,也有学者对“区域”进行了分类。里乌库勒托(Sulevi Riukuleto)认为,“区域”可以被定义为次国家、超国家或跨国创造物^[9]。他所谈论的即是国内的地区、由地理邻近形成的区域和超越地理因素的区域组织。基辛格把“区域”划分为宏观区域(经济和贸易集团,如欧共体、南方共同市场、亚太经合组织等)和微观区域(如巴斯克地区、墨西哥北部或东南部),虽然后者指的是一国内的子单位,但在同一领土内建立了跨国生产过程,其技术、产品和投资的资本遵循微观区域以外的外部利益^①。

在国内学术界涉及“区域”概念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中,王逸舟指出,“区域”范畴正在超越单纯的自然地理空间,向更广阔的维度扩展^[10];谭萌分析了海外研究的“区域”知识谱系及其变迁^[11];王启龙区分了英语有关“区域”的多种表述(area、region、district)^[12];赵裴、姜锋突出了西方学术界对“区域”区分敌我的研究特色^[13];汪晖提出,在目的论的时间性框架下,西方的区域空间概念被时间化了,因而从属于欧洲中心或日耳曼中心的历史叙述^[14];李优、张宇权认为“区域”兼有地理事实和社会建构的双重特性^[15];王在亮、高英彤把西方不同的区域观念总结为物质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本体论和后现代主义本体论三种^[16];程美宝指出,日本学者滨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在美国经济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市场圈”理论基础上提出的“跨国”而非“国际”的区域研究取向具有重要意义^{[17][21]}。上述观点在总结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发展区域国别学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计划对“区域”概念及其与“国别”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界定和探讨,然后重点从世界史的视角分析“区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以就教于学界。为了避免问题的复杂化,本文对“区域”构成的定义只限于民族国家。就本文主题而言,目前国内外没有类似的研究。经查阅文献,已有的研究包括:断代性的世界“区域”研究^②;具体“区域”的历史研究(regional history),这类研究数量大,涉及东亚、中亚、东南亚、中东、中欧、拉美等区域及各种区域组织;也有学者研究“新的区域史”,诸如分裂的城市、欧洲的“欧区”(Euregions,如奥德拉姆,即波兰和德国之间从波罗的海到捷克边境的地区)以及所谓的潜在国家(如加利西亚)的当代史^{[9][124]}。

一、有关“区域”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区域”的定义与特点

首先,区域国别学所研究的“国别”(country),即国家,具体说就是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区域”(region,area)就是由一些相互邻近的国家(还包括一些尚未独立、从而取得国家地位的地区)组成的地理区域,它们在地理、气候、民族、语言、文字、宗教、文化、历史等方面存在着密切联系,甚至具有某种类似性。人们很容易认为“区域”与“国别”二者的特点鲜明,不容混淆,似乎不证自明,但这只是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结论。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历史和现实中的区域与国家,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一些大致的特点:

第一,区域与国别概念的相对性。首先是各国的版图各不相同。一方面世界上存在一些领土很小的“袖珍国家”;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领土辽阔的大国,这些大国(甚至一些中等国家)内部的情况都相

① 转引自 Ursula Oswald Spring. *Ursula Oswald Spring: Pioneer on Gender, Peac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od and Water*,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p. 286.

② 例如,希拉·佩格在他的著作中探讨了当代世界一些区域组织的发展,参见:Sheila Page. *Regionalism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当复杂,它们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地区”,如俄罗斯、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是文明国家(白鲁恂、马丁·雅克)或文明型国家(张维为)的说法间接证明了这一点^①。

第二,区域和国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变。历史上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通过军事征服把若干地区转变为一个国家,一战后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则把几个国家的领土转化成若干地区(东欧、中欧、中亚、高加索等)和国家,苏联解体而演变为独联体是最新的例子。巴里·布赞认为,帝国可以适当地被视为一个“等级制的国际体系”,因为其所包含的单位范围,在完全从属的、半独立的和虽然独立但帝国对其有巨大影响的单位之间变动^{[18][157]}。

第三,区域与国别的相互渗透性。区域的形成原本是从地理、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因素考虑的,但现实的区域主要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而国家边界事实上可能穿越在地理、经济、人文等方面具有统一性的地区,从而造成区域与国家之间的不吻合^②。

第四,区域概念的建构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具体区域的名称和内涵会随着身份的流动而变化,这是因为定义区域的“他者”(外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与世代生活在区域中的“我者”的认识差距。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场名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理论运动席卷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其核心意涵在于将“空间”(space)变成一个理论范畴,视空间为一种有助于理解人类主体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现象生产的社会建构。按照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观点,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物质的对象,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活跃的、主观的对象^③。因此,人文地理学家提出,包括国别、区域,甚至全球在内的空间地理尺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17][25]}。

因此,从历史和理论的视角看,区域是一个具有多种属性的复杂概念。

(二)区域的划分及其影响因素

一般而言,“区域”概念具有不同的划分标准,适用于不同的场景。

第一,地理因素,包括地质、地貌、土壤、生物、水体、大气和人类活动等等^[19]。其在一些区域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一些重要的地貌(山脉、高原)对于河流走向、季风^④、风向和降水产生了突出影响,它们和其他地貌(大河、沙漠、海岸)构成人类交往的地理障碍,从而形成了一个个自然的地理区域和相应的经济形态。这些区域促进了区域内的文明交往,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与其他区域的交往。在东亚,高耸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北部的蒙古高原和东部延伸至南部的漫长海岸线,确保了本地区成为一个一定程度上封闭的地理和文明区域,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丰沛降水决定了本地区的经济形态不同于南亚和西亚、中亚。同样,北方连绵起伏的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决定了高原以南地势低洼的南亚成为一个独特的地理和文明区域,而撒哈拉沙漠把北非与热带非洲区分了开

① 参见 Lucian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② 例如,中亚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费尔干纳盆地,在苏联时期划分给了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三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三国的边境线犬牙交错,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

③ 林鑫《区域研究中的“空间”》,载于《亚洲概念史研究》第9卷,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有关亨利·列斐伏尔的观点,参见:Olusola Oladapo Makinde and Amao Funmilayo Lanrewaju. “Henri Lefebvre Theory of Space and Social Production Philosophy: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Global Journal of Arts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 Issue 1, Jan 2024.

④ 有学者认为,过去几千年间,地球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季风势力衰退,北方的副热带高气压南下,造成北半球部分地区的气候干旱和沙漠化,从中国新疆地区往西到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同一纬度的地区分布着许多面积广阔的沙漠。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因此灭绝。但中国是一个例外,原因是青藏高原的屏障作用,造成东亚季风形成,保障了长江、黄河流域的丰沛降水。参见王会昌《古典文明的摇篮与墓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来。当然,在有的区域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隔,决定该地区区域划分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

地理方面的区域划分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性。众所周知,地球可以划分成不同的大陆,包括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南极洲。每个大陆可以按照地理方位进一步划分,如亚洲一般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欧洲一般分为东欧、中欧、南欧、西欧、北欧;美洲一般分为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等。以上区域可以进一步细分,如西亚可以分为北层、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

第二,政治、经济因素及其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变迁。在政治方面,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是古代东方帝国和近代西方殖民帝国的扩张和征服,统一的政权及其推行的政策促进了相关领土内的经济、社会整合和文化统一。在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大征服使西亚、北非的辽阔地域纳入帝国统治之下,形成了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包括所有阿拉伯国家,以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为准)和伊斯兰世界^[20]。近代俄国的征服则把封闭的中亚收入囊中,使其受到斯拉夫文化和现代化的浸染。拉丁美洲也是同样的例子,其名称来源于该地区原来的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其官方语言均属印欧语系拉丁语族)的殖民统治,这一统治对当地的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历史因素。除去以往存在、现时已废弃的区域外,即使20世纪以来出现的区域也可能发生变动。例如,作为区域的“东南亚”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的一本游记书名中,所指的是印度、马来亚、锡兰、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到1943年,二战中的同盟国出于军事和战略需要,将“东南亚”划定为今天的地理区域,美国区域研究学者在冷战时期的学术活动和著述中进一步应用和传播了这一术语^[21]。匈牙利作家彼得·埃斯特哈齐(Péter Esterházy)指出,1989年之后,他先是作为“东欧人”被对待,然后是“中欧人”,接着是“新欧洲人”,最后是“非核心欧洲人”^{[22][63]}。

第四,霸权因素。当今世界有关区域的划分和命名主要是近代以来西方确定的,体现出西方在工业革命以来确立的政治、军事和文化霸权。在近代以前,地理学知识是不系统的、破碎的,有关区域的知识基于不同的帝国和地区、文化。随着大航海运动的开始,西方国家借助于广泛的殖民、探险、传教和学术活动,对世界各地的地理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逐步确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区命名体系。二战后,美国按照自己的战略需求,对世界各地的区域划分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直到冷战后仍在进行。

二、“区域”的形成和历史演变

本文主要从历史视角讨论区域的演变及其与国别的关系。

(一)远古部落和部落联盟时代——没有国家的“部落区域”

远古形成的人类逐渐分布到了非洲、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广阔土地上,使用原始的石器、木器、骨器、陶器等从事采集、渔猎活动。这一时期,由于自然界的土地广阔,而人类的数量有限,不同的部落生活地域交集不多,因此,这一时期的区域主要是部落的生活区域。作为参考,北美的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cy)形成于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主要生活在今美国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其五大部族莫霍克人、奥奈达人、奥农达加人、瑟内萨人和卡尤加人在纽约州北部组成联盟,后来图卡罗拉部族于17世纪初加入^①。

(二)城邦时代——小国林立的“文化-经济区域”

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人类进入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时代。在农耕地区形成了早期国家,即城邦,后者是公民集体的小国寡民的国家,往往有一个(或两个)城市作为中心。在历史上,分布在一个区域的一组城邦通常构成一个大文化圈,例如两河流域、腓尼基、希腊和中美洲的玛雅城邦。以两河流

^① “The Iroquois Confederacy: A Powerful Alliance of Nations”, 2024-09-24, <https://crosscollege.org/2024/09/24/the-iroquois-confederation-a-powerful-alliance-of-nations>.

域的苏美尔为例,当地人统一使用苏美尔语,其城邦主要包括埃利都、基什、拉格什、乌鲁克、乌尔、乌玛和尼普尔。这些城邦各有一个主神,即保护神,他既是自然神,也执掌某种社会职能,而且所有城邦的保护神的名称和职能不会重复,并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神灵体系。例如,苏美尔三大主神安努(天神)、恩里尔(地神)和伊阿(水神)分别为乌鲁克、尼普尔和埃利都的保护神^{[23]11-12}。因此,苏美尔是一个文化的区域,而非政治区域;虽然历史学家称呼其为“早王朝”,但它从来没有统一过,只存在过统一的意识^①和城邦霸主。在当地,强大的城邦在某个阶段可以控制其他一些城邦,或以它们为首形成城邦联盟,如基什与阿克沙克建立了联盟,拉加什的征服也造就了一个地域广阔的联盟。在乌鲁卡其那(Urukagina)改革末期,乌玛联合乌鲁克、乌尔和扎巴拉共同发兵,一举战胜了拉加什。此后,乌玛国王卢加尔萨吉西(Lugalzagesi)统一了整个两河流域,定都于乌鲁克,自称乌鲁克之王。但苏美尔最终被北方的阿卡德王国吞并。

与此类似,希腊也是一个城邦世界。各个城邦都有它们的主神,即保护神,德尔斐是统一的祭祀中心。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联盟,即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但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四分五裂的希腊城邦终于被北方的马其顿吞并。

不过,两个沿海地带的文化区借助其强大的航海船队、贸易和海外殖民在地中海建立了其庞大的海外殖民地,构成了古代世界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区域,这就是希腊和腓尼基。30多个希腊城邦在环地中海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包括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爱奥尼亚、色雷斯、伊比利亚半岛和利比亚海岸。古希腊的殖民城邦分为两种,即作为母邦的子邦和小型贸易站^[24]。腓尼基的殖民地以西班牙加的斯和迦太基为核心,它们通过建立贸易中转站形成覆盖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及西西里岛的贸易网络,控制了地中海至大西洋的染料、银矿等战略物资的贸易。这些殖民地采取松散的联盟形式,其中的迦太基发展为西地中海政治中心,主导了西地中海的贸易。这里的迦太基实际上已经超越城邦而进入了王国阶段。

中国的考古遗址也显示出华夏早期文化区的存在,如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的龙山文化区,其属于铜石并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这一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的颛顼、尧、舜、禹时期,即文献所说的“万邦”“万国”林立的时代。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以石筑围墙、军事防御体系为标志的聚落,如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老虎山遗址和环岱海遗址群,考古学界认为这些石城聚落已具备城市雏形,城乡分野形成。但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应称为“城邑”,因为其主要功能是治下与防御,缺少商业功能,因而明显不同于西方早期城市(“市”指商业集市)^[25];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万邦时代”,就是宗法血缘组织重新组合与发展时代,各邦的实质是“族邦”,是不断强化的宗法血缘共同体^[26]。

(三)文明多元的有限君主制王朝时代——区域与国家的重合

随着城邦时代的结束,世界各地先后进入了王国时代,其中部分王国也称为“帝国”^②。早期的王国资源、实力和治理能力有限,因此它们依靠不同手段控制周边的方国和被征服地区,同时内部的文明也没有充分整合,从而形成了一个文明多元、君权受限的有限君主制度。

在中东,阿卡德王国(约前2371—前2230)统一两河流域后,国王萨尔贡(Sargon)率军远征至埃及、两河流域北部的苏巴尔图、小亚、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在这块国土几乎囊括了整个新月地带的广阔版图内,国王任命许多阿卡德王室成员与贵族担任了被征服地区的总督或行政长官和高级祭司,极力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其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强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推动君主的偶像化和神化、在经济上统

① 根据《苏美尔王表》,洪水之前“王权下降自天,王权在埃利都”,而“洪水涤荡之后,王权下降自天,王权在基什”。上述说法反映了《王表》成书的公元前3千纪末叶时苏美尔的大一统思想。

② 有关“帝国”存在不同理解,参见饶淑莹《转型时代的帝国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57页。

一两河地区等。但是,地方的分治势力依然十分强大。许多苏美尔城邦仍然保持着自治机构和一定的独立性,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塞琉古王朝。所以,萨尔贡在自称“阿卡德之王”时,依旧保持了“基什之王”的称号。第三个国王玛尼什吐苏(Manishtusu)向基什、马拉德等四个城邦购买土地的地界石铭文,说明国王仍须尊重城邦的权利。而且一些城邦继续由原来的地方统治者治理,如乌鲁卡其那晚年曾任当地总督。在此后库提人约一个世纪的统治中,苏美尔各城邦纷纷复兴,一些地方长官或平民自立为王。其中,拉加什最为强大,其国王古地亚(Gudea)威加四方,据称控制了尼普尔和乌鲁克,并与许多城市进行贸易。然而,乌鲁克最终恢复了实力,其国王乌图赫加尔(Utu-hengal)击败了库提人,但乌尔国王乌尔纳姆(Ur-Nammu)最终胜出,开创了乌尔第三王朝(前2113—前2006),又称“新苏美尔”时期。此后,西亚先后建立了古巴比伦(约前1894—前1595)、加喜特巴比伦(约前1530—前1155)、亚述(约前2000—前610)、新巴比伦(前604—前539)、波斯帝国(前550—前330)等王国和帝国。

虽然上述中东王国(帝国)的中央集权不断发展,但其征服的部分省份依然由原有君主统治(间接统治),并且帝国的城市延续了远古以来享有的自治,包括新建的希腊城市和原有的东方城市,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城市保持了自治的市政机构,并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市政机构由长老委员会组成,其中许多长老是神庙的僧侣。第二,城市继续享有传统特权,包括免税权和免除劳役的权利等;此外国王还有义务向神庙馈赠礼物、重修神庙和公共设施。第三,城市保留了对城郊大片土地的控制。第四,城市往往保留了原有的宗教和文化。王国和帝国形成后,其中最强大的城邦的保护神便成为王国和帝国的主神,如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但是,新的统治者一般尊重原有宗教,像马其顿人在东方修建的新神庙仍保持原有的东方造型,他们还拨款修整旧的神庙,并在神庙中祭祀。宗教传统的延续,意味着僧侣阶层的精神和世俗权力未受削弱^[27]。来自欧洲的马其顿统治者和罗马帝国甚至谋求把自己的宗教与东方的传统宗教融合起来。

在中国,夏商周三代建立了一个实施间接统治的有限君主制王朝体系。夏后(君主)的直接统治区域主要局限于夏后氏部落,基本上不存在对全国进行有效统治的中央权力机构。夏朝设立的各种官职权限一般仅及于夏后氏部落,因此,夏代国家实际上是夏后氏与一些同姓和异姓侯伯所控制的方国部落结成的松散联盟,各方国部落对夏后作为天下共主地位的承认和夏后不干涉各方国内政是该联盟存在和维护的基础。商朝的情况有所不同,商王以建立国王直接统治下的王畿(“内服”)、加强对受册封的诸侯国和商王认可的臣服方国(“外服”)的控制、以王权超越神权等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在方国联盟中的权威和权力,但他的权势在晚商时期的急剧扩张严重地削弱方国联盟的情况下,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西周的统治者依然沿用传统的君主间接统治体制,但不同于夏商两代以武力威慑来控制地方诸侯的思路,周王改为大量分封同姓亲属为地方诸侯,确立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尊尊”“亲亲”的血缘关系,从而把周天子对诸侯的政治统治与家长对子嗣的宗法统治合而为一。但到西周中后期,宗法分封制开始走向反面,各国诸侯日趋坐大并力图脱离中央王朝的控制^{[28]2-4}。因此,在三代,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国国家化进程显示出逐步扩大的特点,一些邻近中原的周边地区的国家进程大体是中原国家制度的延伸,可以分为殖民模式、土著自动模式和浅层控制模式,这三种模式涉及的地区在国家化的程度上存在差别^{[29]48}。另一方面,从中原王朝中也发展起来了主张“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儒家公羊学派认为《春秋》的要旨在于“大一统”。而且,夏朝君主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说成是贯彻“天”的意志,从而把神权与王权结合起来。此外,自先秦以来,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初期阶段。

在欧洲,取代希腊城邦的马其顿人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包括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建立的三个帝国在内,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形成“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的宗教明显体现出东西方

交融、派别分呈的特点,最终融合为世界性的一神教基督教^[30]。随后建立的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地区征服了幅员广阔、文化各异的海外领土,组建行省进行统一管理。这些行省对于地方形成完整的地方制度、巩固罗马国家的稳定、统一和领土安全、促进各民族的罗马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行省制度也存在着不利于中央集权的一些做法和情况,如行省总督任期短暂(1年)、总督权力较大、行省城市拥有全部或部分自治权、各行省间地理距离遥远而不便管辖、间接税实行包税制削弱了帝国权威、行省安置退役军人的做法容易滋生军事独裁等。公元293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us)实行四帝共治,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各由一位“奥古斯都”统治,下设“恺撒”作为副帝及继承人,以便缓解行政与军事压力。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去世前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它们分别担任东、西罗马帝国皇帝,从此帝国正式分裂。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国教,但西部罗马教会与东部君士坦丁教会之间为争夺教会最高权力展开长期斗争,孕育了以后教会的分裂。

总之,本阶段在东西方都出现了规模可观的帝国,它们包括了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和文化。在内部文明交往和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同时,各帝国总体上也展示出政治、经济和文化明显的多样性,显示出“亦国亦区”的特点。

(四) 文明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时代——“文明区域”的形成

本阶段,亚非欧大陆形成了若干地域辽阔、文明特点突出的大帝国,这些帝国以古代文明和“轴心时代”文明为基础,形成了普世的世界宗教和文明。

在中国,秦统一六国后,采纳了推进统一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书同文”,以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车同轨”,统一车辆轨距和道路标准;“行同伦”,统一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地同域”,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实现疆域统一;“度同制”,统一度量衡,促进赋税征收、市场交易的标准化;“改币制”,废除六国货币,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将通行货币统一为两种(黄金和铜钱)。秦以后,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持续增长,并长期维持统一王朝,虽然期间也多次出现由于周边少数民族入侵或内部动荡形成的分裂,但最终依然归于一统。在意识形态领域,汉朝建立后进一步统一,“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的正统地位确立;同时,佛教开始传入中土,至隋唐达到鼎盛,形成禅宗等八大宗派,本土化的中国佛教形成,宋元以后佛教进一步融入中国文化,确立了儒释道相互调和的三教体制。在国际关系方面,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覆盖东亚、中亚和西亚部分地区的国际体系,即“宗藩体系”(又称“朝贡体系”“册封体制”“华夷秩序”等)。其中,受中国影响,包括朝鲜、日本和越南在内的东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更形成了高度的统一性,包括政治制度、稻作经济、儒学、佛教、汉字、历法、筷子文化、民俗和节日等。

在中东,公元7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穆斯林建立了横跨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帝国。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中东古老的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波斯等地区和国家经历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演变过程,伊朗高原以西地区的各民族与穆斯林征服者逐渐融合形成了阿拉伯民族;伊朗高原及其以东地区的一些民族(波斯人、突厥人等)虽然没有改变民族身份,但接受了伊斯兰教,其文字改用阿拉伯字母,其语言则吸收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部分词汇。阿拉伯帝国由此形成了名为“伊斯兰秩序”(Pax Islamica)^①的地区秩序,又称“乌玛”(Ummah),乌玛有两种含义,即宗教社团和政治社团,此处属后者,即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国家的居民除穆斯林外还包括“有经人”(迪米),如基督教徒、犹太人和拜火教徒等,他们在遵纪守法、按时纳税(包括异教徒缴纳的人头税)的前提下,享有包括宗教、教育和其他方面在内的社团自治。因此,阿拉伯帝国成为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通晓波

^① 西方学者沃特用“Pax Islamica”(“伊斯兰治下的和平”)一词描述穆罕默德依据其部落政策建立起来的社会,参见:W. Montgomery Watt. *Mohammed at Medina*, Oxfor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7, p. 78.

斯语的波斯人^①和基督徒、犹太人大批进入政府机关,军队早期有大批波斯人,后期则为突厥奴隶所取代,波斯文化也对政府的运作和伊斯兰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早期伊斯兰的原则是“一个国家(伊斯兰国家),一个君主(哈里发),一个宗教(居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这就是“伊斯兰秩序”和“乌玛”的内容,另外一个相关概念是“伊斯兰地区”(Darel Islam,原意为“伊斯兰家园”)。与其对应的是异教徒占有的“战争地区”(Darel Harb),而“伊斯兰地区”在合法性或主权方面与“战争地区”是不对等的,穆斯林应当将后者从某种“自然属性”转变为真主的领土^②。所以哈里发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征服扩大“伊斯兰地区”的版图。不过,随着穆斯林对中亚、印度西北部、北非和西班牙的征服,阿拉伯帝国的冲击力已经达到极限,阿拔斯王朝后期中亚、波斯和北非地区纷纷独立,建立了若干小国,甚至一度出现过三个哈里发。穆斯林学者认为,哈里发国已经演变为“穆尔科”(mulk),即“王国”。著名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首次指出,国家是一个独立实体,从哈里发国向穆尔科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而穆尔科保留了哈里发国和伊斯兰的因素^{[31][43-49]}。

在印度,公元前4世纪以后,先后形成若干领土辽阔的大王朝,如孔雀王朝、贵霜帝国和笈多王朝。它们以北方为基础,领土几乎囊括了整个次大陆。不过,由于印度的种姓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其不需要国家来“维持和复制”,因此,“印度的总体政治秩序在诞生之初就是去中心化的,并保持着这种状态,尽管间或有一些强大的帝国统治,但这种统治在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之后主要是外来者强加的”^{[32][35-36]}。在文明方面,印度以“轴心时代”的吠陀教为基础形成婆罗门教,逐渐发展成为印度教,此后崛起的佛教虽兴盛一时,但在穆斯林入侵后最终衰落。穆斯林征服后的印度先后经历了德里苏丹国和来自中亚的巴布尔(Iahiruddin Muhammad Bobur)建立的莫卧儿帝国时代,形成了以占人口少数的统治的穆斯林文化与本土的印度文化交融的多元文明。莫卧儿皇帝阿克巴(Akbar,1556—1605年)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统治精英的融合,以加强中央集权。印度教贵族(官员、军官、财务官员、商人、地主)同样成为帝国的统治精英,他们与穆斯林的军事和行政精英(主要是阿富汗人、波斯人、突厥人和印度穆斯林)共事。这些精英通过婚姻、财产或官职转让等形式组成不同的集团。莫卧儿帝国在文化方面推进融合了印度文化与波斯-突厥文化的印度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以便为政治精英创造一种统一的文化,波斯语和作为印地语方言发展起来的乌尔都语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这一时期印度的建筑和绘画也体现出本土文化与波斯文化的融合^{[33][522,525-526]}。在南亚和周边的西亚、东南亚地区,尼泊尔、锡金、锡兰和阿富汗,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受到印度宗教和文化的影响。

在欧洲,罗马共和国实现了地中海地区的统一,而其后的罗马帝国把基督教确定为意识形态和国教,最早建立了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文明区。然而,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揭开了欧洲政治与文明重组的新时代。在西罗马帝国崩溃的同时,来自欧亚草原的日耳曼人迅速接管了西欧的罗马遗产,建立了信奉基督教的一系列日耳曼王国,被迫遵守旧制的教皇在理论上不得不服从东罗马皇帝。800年,教皇在罗马为查理曼(Charlemagne)加冕称帝,查理曼帝国建立,罗马教会念兹在兹的“基督教帝国”罗马帝国似乎重生在望,但帝国伴随着查理曼大帝的去世走向衰落,到843年分裂为东、中、西三个法兰克王国,后演变为德意志、法兰西和意大利三个封建王国,从此奠定了欧洲分裂的格局。962年,教皇约翰十二世(Pope John XII)再次在罗马为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Otto I)加冕称帝,称为“罗马皇帝”,德意志王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从1471年起,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帝国极盛时期的疆域包括近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

^① 他们中很多人原本就是萨珊王朝的官员,熟悉萨珊政府的运作,而萨珊的官方档案均以波斯语书写。

^② Majid Khadduri. *The Islamic Law of Nation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66, p. 13. 转引自 Amr G. E. Sabet, “The Islamic Paradigm of Nations:toward a Neo-Classical Approach”, <http://www.gmu.edu/academic/pcs/Sab82PCS.html>.

瑞士。尽管帝国的领土广阔,但它逐渐演变为数百个小诸侯国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在日耳曼人占领西欧之后,斯拉夫人控制了东欧、中欧和东南欧的大片地域,先后建立了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大摩拉维亚国、基辅罗斯、捷克公国和波兰王国,信奉了东正教(东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和天主教(西斯拉夫人)。在东欧,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于1453年灭国后,莫斯科大公国自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引进了拜占庭的双头鹰国徽,并于1547年把莫斯科大公的称号改为“沙”(恺撒)。由此,东欧形成了一个强大帝国,但俄罗斯帝国发展的晚近使其在文化上对其他斯拉夫各国的影响受限。

以上分析的主要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区域发展。除了农耕,远古社会的大分工还发展出了游牧文明,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和希腊等定居农耕文明北方的欧亚草原。这个与农业地带并行的游牧地带,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由于雨水稀少,土地难以种植,只能以游牧为主以利用当地的草原资源^{[34][55]}。公元前3世纪,匈奴在欧亚草原上建立了中央王庭的统治结构,此后形成的游牧帝国包括匈奴、突厥和蒙古,同时中亚地区在不同时代也受到南方各农耕文明的影响,包括波斯、中国、阿拉伯等,由此形成了包括基督教、拜火教、佛教、儒学和本土的腾格尔主义等多元文化,而最终演变为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地区文明。

与中亚类似,东南亚地区地域广阔,既有大片的陆地,也有大面积分布的许多岛屿,众多的民族形成了斑斓多彩的文化。东南亚的历史经历了由单一中心到多中心的演变过程。在公元6世纪以前,扶南是中南半岛上最大的地区中心,此后,真腊逐渐崛起成为地区中心,而在海岛地区,室利佛逝成为另一个新兴的地区中心。11世纪以后,缅甸、泰国的崛起和越南的独立构成中南半岛三国并立的格局,而在海岛地区,爪哇和苏门答腊成为地区中心,爪哇先后兴起了谏义里、新柯沙里、满者伯夷等地区大国。在文化方面,东南亚各国受到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深刻影响,在东南亚的印度化王国逐渐衰落后,印度的宗教、梵文、法典等文明要素在一些地区继续保留或者进一步本土化,而最终伊斯兰教成为东南亚文明的一个重要成分。许多学者用曼陀罗来定义东南亚的国际体系^①,后者的特点是边界的不稳定性和中心与边缘的易置性,并且东南亚的曼陀罗体系存在多中心的特点^[35]。

总之,除了以广阔区域的部落和少数国家为特点的非洲和美洲^②及只有部落而不存在国家的大洋洲外,这一时期世界主要地区一般都形成了幅员广阔、地理和经济形态多样并具有鲜明文明特色的帝国和区域,如东亚的儒家文明区、中东的伊斯兰文明区、南亚的印度教-伊斯兰教文明区、西欧-中欧的天主教文明区、东欧的东正教文明区。同时,欧亚草原(尤其是早期)和东南亚地区体现出突出的多元文明特色,政治上存在主导帝国的不明确(前者)或完全付诸阙如(后者),而西欧实际上也不存在真正的地区大国。从附表可以看出类似于“区域”的各帝国复杂的地理气候和经济人口分布。

(五) 欧美殖民宗主国主导下的区域时代——“殖民区域”(殖民帝国)的形成

1500年前后开始的大航海时代揭开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序幕。曾经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边缘地区的西欧,最先进入了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一般认为,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来的30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欧洲近代史的肇始。尼骚将民族国家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完全自主和领土统一,中央集权制,主权人民化,国民文化的同质性,统一的民族市场^{[36][271-281]}。民族国家还有一个特征,即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兴起意味着王朝国家的衰落,后者的特征

① 曼陀罗理论是古印度学者懦底利耶在其编撰的政治著作《政事论》(即《利论》,朱成明译注,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中提出的,一般认为该书的核心内容形成于孔雀王朝。见[英]巴里·布赞、[加]阿米塔·阿查亚《重新想象国际关系学:三种非西方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李东琪、颜震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第38页;朱云汉、郑永年合编《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与全球新秩序的兴起》,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版,第440页。

② 有关北美和玛雅地区的部落,参见:Jennifer Birch. “Premodern Confederacies: Balancing Strategic Collective Action and Local Autonomy”, *Frontiers in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February 2022, pp. 3-4, 9-10.

是来源于君权神授、家族血缘的政治合法性、君主制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变动不居的领土、市场分裂、国民文化的异质性等等。在本阶段,世界的区域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附表 世界主要帝国不同气候区的人口分布 (单位:%)

气候区	亚历山大帝国	罗马帝国	汉朝	倭马亚帝国	蒙古帝国	奥斯曼帝国	帖木儿帝国
热带地区	-	-	-	-	0.46	-	-
干旱地区	50.7	17.1	17.6	54.3	22.3	37.0	60.0
温带地区	26.4	77.2	67.4	25.3	51.2	48.7	8.7
寒带地区	-	0.33	12.1	-	18.3	1.5	0.06
高山地区	22.9	5.3	2.8	20.5	7.8	12.9	31.3

资料来源:根据海德研究项目(HYDE)的历史人口统计数据计算。见[美]杰弗里·萨克斯《全球化简史》,王清辉、赵敏君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97页。

第一,欧洲作为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其民族国家从地理上可以分成两个类型。在西欧,形成中的民族国家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在东欧和中欧则是领土辽阔、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或帝国,即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虽然前三个帝国在19世纪中叶经历了资产阶级改革或统一运动(德意志帝国是1870年普法战争胜利后建立的),但民族压迫的继续存在意味着它们依然是“民族的监狱”。由此观之,在起源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其强调的是一国一族的单一民族国家)日益流行的环境下,东欧和中欧的多民族帝国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王朝帝国“亦国亦区”的特点,从而具有内在的脆弱性。

第二,西欧的封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和海外移民实现了自身的身份转换,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最早进行航海探险的封建国家。葡萄牙逐步在西非、东非、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印尼、中国和巴西建立了殖民地,垄断了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贸易。西班牙通过哥伦布的航海确立了在拉美、加勒比海和菲律宾的殖民主导地位,太平洋成为西班牙的“内湖”。由于教皇支持两国扩张领土及传播天主教,而西班牙进入菲律宾冒犯了葡萄牙的“领地”,导致双方的冲突。1493年5月,教皇作出决断:双方以子午线为界,线西归属西班牙,线东归属葡萄牙。但两国并不遵守上述指示,两国于1504年签订《陶尔代西里雅斯条约》,从而使巴西归属葡萄牙;1529年再次对“教皇子午线”做出调整,使西班牙获得了独占美洲的权利。随着荷兰、英国、法国的崛起,它们进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未能控制的亚非和美洲地区:荷兰占领了印尼,英国控制了埃及-苏丹,占领了南部非洲、大洋洲,法国占领了北非和印度支那,英、法及荷兰、德国等同时进入了北美、印度和非洲;俄罗斯夺取了奥斯曼、伊朗和中国的部分领土。最终,英国战胜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完全控制了印度、加拿大,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日不落帝国”;法国在非洲和印度支那攫取了大片领土;俄国把中亚并入自己的领土。另外,德国、意大利在非洲、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控制了部分领土,美国通过战争夺取了墨西哥的大片领土和古巴、菲律宾。

上述在其发源地属于单一民族国家的封建国家^①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除外)由于对外扩张,在海外占有面积广大的殖民地,形成了具有近代特点的不同“区域”,即殖民帝国。这些作为宗主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可以称为“民族-殖民国家”,即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建立的殖民帝国。另外,殖民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移民殖民地,它们占殖民地的少数。这类殖民地一般原住民人口有限,甚至在殖民统治期间因大量屠杀、传染病流行、繁重的劳役而大批死亡,同时大批宗主国移民入境并长期定居,而且从

^① 虽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不存在主权人民化的封建国家,但由于它们已经成为主权国家,所以可以视其为民族国家。

非洲大批输入黑人劳工,从而大大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巴西、南非、古巴、海地等。其二是非移民殖民地,它们占殖民地的大多数,往往拥有众多的本地人口,一些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而宗主国的移民人数不多,并在殖民地独立后基本上撤离,如北非。上述殖民地的一个特点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空间分离,只有俄国与其殖民地是在陆地上连接起来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因此称其为“全球性帝国”^{[37]7}。另外,这些殖民地也是通过军事手段获得的,而美国在独立后的拉美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等经济手段实现控制,建立了隐形的殖民“区域”。

第三,欧洲国家通过地理大发现垄断了对各大洲、区域、国家和地方的命名,建立了统一的世界不同区域的地理知识体系,提出了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并符合其地缘利益的“区域”名称。其中,有关大陆的名称,“非洲”(Africa)一般认为是罗马人以当地的一个土著部落阿非利(Afr)部落命名的,“非洲”是“Africus”的阴性形式,意即“阿非利部落的土地”。类似的词汇还有“亚洲”(Asia)^①。上述自然地理词汇本来源自东方,但经过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包装,即成为西方的地理语汇了,而“新英格兰”“拉丁美洲”等则完全是近代创新的西方词汇。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亚洲的两个流行的人文地理区域词汇,即“近东”(the Near East)和“远东”(the Far East),它们完全体现出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方位和欧洲的地缘政治经济需要。“近东”概念出现于1856年即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政府用来代指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北起巴尔干半岛、南迄埃及的地中海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相当于意大利语中的“黎凡特”地区^{[38]150}。很明显,“近东”概念是针对争夺奥斯曼帝国领土控制权的“东方问题”,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远东”所指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均在英属印度以东,其地缘政治意义不言自明。地理范围更大的两个词汇就是西方人视野中的“西方”和“东方”。“东方”和“西方”在词源上最早源于拉丁语,罗马人以罗马城作为世界中心坐标,以西为西方,以东则为东方。它们所指的“东方”包括西南亚和东北非,这些地区属于罗马行省。随着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主要指英法两国影响下的欧洲地区,此后扩大到大西洋两岸的其他发达国家^[39]。同时,近代早期欧洲开始关注中国、奥斯曼等东方大国,包括它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而有关《圣经》的研究和在中东的考古发掘推动了东方学的形成。1779年,英文中首次出现“东方学”(Orientalism)一词,此后在欧洲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亚非地区研究的东方学学科。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认为,东方学的研究对象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拥有自己的文字、分布广泛的宗教系统和庞大的官僚帝国这种政治组织形态,而西方学者认为这些国家的历史表现出明显的停滞^{[40]24,26}。因此,欧洲有关“西方”和“东方”的概念体现出其突出的文化优越论倾向。

第四,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和渗透破坏东方传统的区域,改变了东方的区域和国家现状。这里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在东方国家国力衰落(如印度、中亚、东南亚、中美洲和南美洲等)或根本不存在国家的地区(非洲、大洋洲)掠夺土地,消灭或控制当地的土著王朝、政权,建立殖民帝国。其中,西班牙打败了南美洲的印加帝国,英国打败了在印度和北美的法国人和当地的马拉特人,荷兰人征服了东印度群岛^②,并将其整合为一个殖民地(印尼),俄国征服了中亚各汗国,上述列强用它们的殖民帝国代替了当地的传统国际体系和区域。第二种是蚕食国力尚可的东方帝国的领土,煽动其境内的少数民族独立,在上述帝国的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削弱它们的社会经济,夺取或控制它们的藩邦等。如欧洲列强蚕食奥斯曼帝国、伊朗和中国的领土,通过国债控制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财政,夺取中国在中亚、南亚和东亚的藩邦等。换言之,类似于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初步实现了有关国家相互关系的“扁平化”,它们希

① Emily Upton. “The Origin of the Names of the Continents”, 2013-05-01, <https://www.todayifoundout.com/index.php/2013/05/the-origin-of-the-names-of-the-continents>.

② 西方人把盛产香料的南洋群岛称为“东印度群岛”。

望在东方复制同样的体制,彻底破坏东方帝国的国际体系而达到其控制东方世界的企图。除了政治军事的控制外,文化殖民是一个重要手段,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司法、宗教、教育、语言等都对殖民地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基督教在非洲、美洲和亚洲的传播改变了一些殖民地国家人口的文化身份。

第五,“全球”、中心和边缘的新区域。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航海在技术上证明了地圆学说以及蒸汽远洋轮船和电报电话的推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物种和产品通过市场进入其他地区,如美洲的玉米、辣椒、番茄和烟草成为旧大陆农田中的作物,而中国的特色饮料茶叶成为印度和锡兰的重要出口与英国下午茶的关键内容。182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世界贸易的年增长率都小于1%,而此后半个世纪内却超过了4%^{[41][171]}。推动这一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全球资本主义的经营从此成为现实,随之而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地位和亚非拉地区边缘地位的形成,它们构成了全球化时代新的“区域”^①。其中,中心地区成为资本积累、工业生产与商品消费的核心,而边缘地区则主要提供原材料^{[41][169]}。

第六,泛民族主义开辟了新的“区域”范围。宁骚认为,泛民族主义(pan-nationalism)是“以有血缘关系的若干民族,甚至以种族和地理单元为单位形成”的民族主义,包括作为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思想工具的泛俄罗斯主义、泛日耳曼主义、盎格鲁-撒克逊主义、雅利安主义以及作为被压迫种族和民族团结反帝的思想工具的泛黑人主义、泛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36][92-93]}。上述思想都是近代形成的,其核心思想是强调有关民族的团结,甚至建立统一国家的企图,而统一国家的出现即意味着从具有统一民族身份的“区域”到国家的演变,19世纪后期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进程就是这样的。在中东,宗教也可能成为泛民族主义的基础,因此号称“三泛”的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地区影响。其中,泛阿拉伯主义主张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实行自治,后来更提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泛伊斯兰主义强调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呼吁伊斯兰世界(“乌玛”)的统一;泛突厥主义以虚幻的“突厥民族”为口号,主张建立从奥斯曼国家延伸到中亚的大突厥国家。可以说,泛民族主义的共同设想,是在一个特定区域建立一个基于“想象的共同体”的统一国家。

第七,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粉碎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美洲殖民帝国,使其演变为独立的拉美“区域”。拉美地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下,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形成了包括土生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作为主要居民的社会,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主要语言,以拉丁文化、天主教和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融合而成的本地文化,从而产生了共同的国民文化和心理,具备了独立的条件。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拉美各地民众经过艰苦斗争,在亚非拉地区率先实现独立,开创了亚非拉殖民地走上独立发展的历史先河。

(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殖民“区域”与独立“区域”的较量

本阶段是从西方的“殖民”区域到亚非拉国家实现独立,建立自身的区域合作和组织的过渡时期。它既见证了殖民主义的最后疯狂及其内部的争夺、战争,也恰逢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坚持。本阶段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一战后欧洲和中东的四大帝国解体。一战的后果是同盟国成员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战败,不得不同意其统治下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拉伯等地区独立;俄国由于苏维埃政权颁布《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各民族享有分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由此波罗的海、高加索、中亚地区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②等地区纷纷独立。因此,一战的结束标志着作为特殊“区域”的

① 萨克斯提出全球化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骑马时代、古典时代、海洋时代、工业时代和数字时代七个历史阶段。见[美]杰弗里·萨克斯《全球化简史》,王清辉、赵敏君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3-6页。

② 波兰在近代历史上三次被普鲁士、俄国、奥地利三国瓜分,其领土分属三国。

四大帝国的消失和一批欧洲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包括后来英国的爱尔兰)。同时,德国也丧失了其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不过,在协约国组织对苏俄军事围攻和红军外线作战的背景下,俄国独立的各个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重新回归并建立统一的苏联国家。

第二,一战后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主张民族自决的背景下,协约国成立国际联盟,把原同盟国统治的地区和殖民地交给英、法等国实行委任统治。其中,由奥斯曼的阿拉伯地区演变而来的委任统治地包括英国统治的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以及法国统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英法获得上述殖民地对于巩固它们在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殖民体系(殖民“区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其从地中海到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的海上交通沿线的防御。此外,英、法、比、日等国也分别接收了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①。协约国战后对战败国的苛刻处理与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等是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第三,德、意、日“轴心国”提出新的“区域”扩张计划。德国在中世纪就通过骑士团的方式向东欧扩张,许多德国移民在东欧地区形成单独的社区。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由此提出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概念。一战后,德国将军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宣称生存空间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希特勒(Adolf Hitler)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谈到德国应当“扩大我们民族在欧洲生存空间”,而“今天在欧洲谈论新的领土的时候,我们首先只能想到的就是俄国以及受其奴役的周边国家”^{[42]515-516}。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Mussolini)则自认是古罗马的继承者,梦想重现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1912年以来,意大利先后占领了利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其在东非的殖民地体系。1940年,大战期间的日本提出以“日、伪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并在太平洋战争中占领美、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然而,“轴心国”在二战中的失败使上述设想付之东流。

第四,亚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通过持续的反抗争取脱离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走向新的高潮,并且持续高涨。在土耳其、印度、中国、越南、朝鲜、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对殖民主义的“区域”构成严重冲击,伊朗、阿富汗和也门获得完全独立,英国不得不同意埃及、伊拉克和外约旦获得形式上的独立,用双边条约代替委任统治的殖民形式^{[43]52-53}。亚非地区的有识之士也开始进一步思考通过“区域”形式实现联合自强和发展。1920年9月,共产国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与会的有来自土耳其、波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突厥斯坦、希瓦、布哈拉、阿富汗等近东和中亚穆斯林民族和区域的代表共1 891人。1917年,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出版了《民族主义》,他在书中指出,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应该只关注本国,而是需要相互学习,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44]。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发表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他明确批判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指出“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阿根廷人曼努埃尔·乌加特(Manuel Ugarte)在1922年撰写了《大祖国》一书,呼吁美洲讲西班牙语的地区统一起来,反对帝国主义^②。

第五,西方国家对其殖民体系的调整。一战前,英国的殖民地大体上包括直辖殖民地、保护国和自

^① 20世纪30年代,大英帝国的领土达到3 300万平方英里。见[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崔顺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7页。

^② 《维贾伊·普拉萨德:亚洲的团结可能吗?》,观察者网,2022-04-23,https://www.guancha.cn/VijayPrashad/2022_04_23_636392_1.shtml;《盛邦和: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及对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批判》,爱思想网,2017-07-20,<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05185.html>。

治领三类。其中,各殖民地成为自治领的时间为:加拿大(1867),澳大利亚(1901),新西兰(1907),南非(1910),爱尔兰(1922)。随着一战后英国力量的削弱,自治领的离心力不断加强。1925年,英国政府专设自治领部,负责自治领与宗主国的联系。1931年12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即英联邦宪章。宪章规定: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白种人统治的自治领与英国组成英联邦;自治领是“独立和平等的主权国家”,英王为国家元首。英联邦成为欧洲殖民“区域”的新形式。

(七)冷战时代——不同意识形态的“区域”对立

二战的结束意味着世界历史新阶段的开始,但随即揭幕的冷战却把世界拖入了东西方集团“区域”对抗的泥潭。同时,第三世界的形成标志着全球南方“区域”的群体崛起,为二战后世界的区域发展增添了新的色彩。本阶段区域演变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自然地理区域演变为政治地理和意识形态“区域”。随着冷战的来临,东西方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界线。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沿东西德国的边界形成对垒森严的态势,在东亚,则是南北朝鲜之间的三八线确定了东西方的界线。在苏联的南翼,美国先后组建了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签订了双边或多边防御协议,从而把包括欧亚地区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严丝合缝地包围了起来。至此,由雅尔塔协议和后来欧亚地区发生的大事件(战后南斯拉夫局势的变动、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所确定的东西方,即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界线最终明晰化。现在,欧洲划分成“东欧”和“西欧”,它们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地理概念,分别代表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包含苏联的欧洲部分)和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对应的“中欧”概念彻底消失了^①。另外,两大军事集团各有其配套的经济组织或协议,此即东欧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和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而且,历史上的军事集团都是为战争做准备的,一旦战争结束就马放南山、解甲归田了,但北约和华约则在冷战持续的40多年一直存在,前者甚至生存至今。

第二,代表亚非拉地区的“全球南方”形成。二战后,被西方国家统治了几百年的亚非拉地区先后走上了独立道路。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前期,发展水平接近的亚洲和北非国家大批独立。其后是20世纪60年代,热带非洲国家纷纷独立。同一时期,太平洋地区及亚洲、美洲的一些小国也先后独立,但主要是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亚非国家的先后独立,谋求地区团结和中立不结盟、实现经济独立成为有关国家的共识。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它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自行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共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1961年9月,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有2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不结盟运动成为南方国家对抗东西方冷战的标志。1964年,77个发展中国家在日内瓦召开的首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期间,发表《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提出关于改革国际经济关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发展的一整套主张。77国集团由此成立。

第三,三个“世界”的形成。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欧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摆脱了二战

^① “中欧”(Mitteleuropa)概念代表了在该地区强大的德语世界文化。近代的这一概念有多个版本,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普鲁士”版本和多元文化的“哈布斯堡”版本。纳粹主义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以及冷战使得这一概念的复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变得不可能,直到1989年德国统一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欧没有自身的区域认同,它仅仅是一个战场,是俄罗斯与“西方”两大文明之间长期激烈冲突的空间,是“一个多种文化共存、交汇和冲突的地区,尽管长期遭受外来统治,但历史上一直是西方文明的坚定捍卫者”。参见:Jan Kubik. “How to think about ‘area’ in Area Studies?”, in Zoran Milutinovic ed, *The Rebirth of Area Studies Challenges for Histor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I. B. Tauris, 2020, p. 68. 中国学者的观点参见:杨烨、王静《中欧概念演变与地缘政治变迁》,载杨烨、高歌主编:《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0页。

造成的破坏,经济迅速恢复。由于这些国家承担的军费较少,同时有效地利用了二战后科技革命的有利条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创造的国际市场等有利因素,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方法推动经济发展,其经济实力快速上升。与此同时,美国先后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军费开支浩大,制造业的国际占比明显下降,黄金储备大幅减少,不得不于20世纪70年代初实现美元与黄金脱钩,并用浮动汇率代替了固定汇率,在亚洲推进收缩战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主席于1974年2月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提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除日本以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三个世界”的理论突出说明了二战后国际经济政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和主要矛盾,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就是这种国际关系新格局形成的一个明显例证。

第四,区域组织大批涌现。在欧洲,战争的破坏使人们迫切地感受到实现统一的必要性,以便通过合作、一体化与联合实现欧洲的长久稳定、安全和发展。1944年,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成立比、荷、卢关税同盟。1951—1957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先后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和《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4月,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上述三个机构统一为欧洲共同体。没有加入欧共体的英国、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士、瑞典、奥地利七国于1960年5月建立名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工业品自由贸易集团,此后冰岛加入,而英国、丹麦、葡萄牙退出,加入欧共体。在亚非拉地区,更是出现了一大批形式各异的区域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1945),非洲统一组织(1963),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伊斯兰会议组织(1969),安第斯共同体(1969),加勒比共同体(1973),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1981),南方共同市场(1991)等。

因此,二战后区域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因冷战表现为东西方对立、割裂的态势,另一方面则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数量迅速增长,并在发展形式上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即区域经济一体化根据成员国发展程度的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等六种形式。同时,这一时期区域组织的发展还受到区域、文化和发展程度的局限,例如不存在跨越南北方的组织。此外,“北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一般比较好,而“南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则由于各种原因发展不那么顺利。

(八)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起伏形势下的“区域”多元化

1991年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解体改变了冷战格局,东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军事的全方位对抗让位于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不过,随着全球化引发的发展不平衡和制造业的国际转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明显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阶段区域演变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苏东剧变导致东西方阵营对立格局的改变和欧洲的“区域”变化。苏东剧变的主要表现是东欧剧变(1989—1990)、两德统一(1990)、苏联解体(1991)和华约组织解体(1991)。上述事件产生了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首先,苏联解体,产生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中亚五国和高加索三国等独立国家,形成了欧亚地区、中亚、高加索等区域概念以及作为区域组织的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其次,在东欧、中欧,“回归欧洲”成为潮流,多数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成为西方“区域”的一部分。再次,南斯拉夫分裂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等六国,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上述国家多数加入了欧盟。最后,“西欧”成为纯粹的地理概念,“中欧”概念再次流行。1988年,“中欧倡议国”组织建立,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后捷克斯洛伐克加入。1991年2月,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国组建了

维谢格拉德集团^{[45]25-26}。

第二,美国根据其战略利益提出对世界区域的新概念。首先是“大中东”。“中东”(the Middle East)作为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是1900年由英国将军戈登(T. E. Gordon)爵士首次使用的。其范围有不同看法,一般公认的包括伊朗及其以西的整个西亚地区和北非的埃及。此概念真正取代与奥斯曼帝国有关的“近东”并迅速流行是在二战后,因为二战期间英国在埃及设立了中东补给中心,美国参与了其运作,因此,“中东”概念的流行反映了二战后新的国际政治现实,即本地区成为西方对抗苏联的前哨以及阿以代理人冲突的主战场,从而对美国的地区和全球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冷战结束后,美国官员开始提出“大中东”(the Greater Middle East)的说法^{[46]7}。2004年2月,美国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提出了“大中东倡议”(外界称为“大中东民主改革计划”),其目的在于推动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大中东”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以色列、阿富汗、巴基斯坦,该倡议提交给同年6月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议论。“大中亚”(the Greater Central Asia)的概念与此相关。2005年8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问题专家斯塔尔(Frederick Starr)进一步提出“大中亚计划”,建议美国以阿富汗为中心,推动中亚、南亚在政治、安全、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建立一个由实行市场经济和世俗政治体制的亲美国家组成的新地缘政治板块,从而保障美国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为了推动计划的实施,2006年1月,美国国务院甚至调整了内部机构设置,把原属欧洲局的中亚五国纳入新设的中亚南亚局^{[47]21}。另一个类似的词汇是“印太”,它取代了原来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亚太”,指印度洋-太平洋地区。2017年特朗普访问亚洲期间,提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说法,此后“印太战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上述地区成为后冷战时期新的“地区安全复合体”^①。

第三,跨越传统界线的区域组织或合作机制。冷战结束后,区域组织完全超越了以往以陆地、文化和发展水平邻近或同质划界的情况,包括以下类型:其一,依据内海和大湖建立的区域组织,如黑海经济合作组织(1992)和里海沿岸国家首脑峰会(2002)。其二,“南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89,包括太平洋沿岸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包括美、加、墨三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6,后改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0,东盟十国及中、日、韩、澳、新15国)等。其三,发展中国家跨区域组织。最典型的是金砖国家国际合作组织(2006)和上海合作组织(2001)。其四,一个区域组织与特定的区域外国家的合作机制。如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1995)、欧盟与一些地中海国家的联系协定(2002年以来)、东盟“10+3”(1997,中、日、韩3国)和“10+1”(2016,中国)。其五,一个区域组织与区域外国家建立的自贸区。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0)。其六,多个区域组织的联合。如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2025)。其七,一国与区域外国家建立的自贸区。如美国与以色列、约旦签订的自贸协议,中国与格鲁吉亚、冰岛、秘鲁、澳大利亚、瑞士等国的自贸区协定。其八,一个区域组织吸收区域外国家。如欧盟吸收塞浦路斯入盟,土耳其等为候选国。

第四,冷战思维继续影响区域的发展。尽管苏联已经解体,华约也已解散,但西方政治家的冷战思维依旧,继续对俄罗斯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堵、打压。北约不但没有解散,反而持续向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扩员,封堵俄罗斯。欧盟虽然不是军事组织,但对俄罗斯怀有敌意,其扩员战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拥有庞大军队、人口众多却不属于基督教文明的土耳其始终无法入盟也反映出欧盟观念的僵化。另一个典型例子是2021年成立的奥库斯(AUKUS,简称澳英美联盟),其主要目标是推动成员国的

① 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基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框架,提出冷战时期有关的亚非地区安全复合体,包括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含北非)、东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见[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8-137页,第177-206页。

防务合作,包括英美为澳大利亚制造八艘隐形核潜艇,从而加强对中国的海上围堵。2024年,日本宣布加入奥库斯联盟,韩国也开始讨论加入的必要性。也是在2021年,美、日、印、澳建立了名为“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非正式战略对话机制,其目标是通过多边合作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2022年,美国等13个亚太国家宣布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便完成“提高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贸易谈判,其实际目的是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孤立中国。

第五,欧盟从区域组织走向超级国家。本阶段,欧盟不断升级内部合作,成为世界上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集团。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签署,次年生效,欧共体演化为欧洲联邦,更名为欧盟。2002年,欧元开始流通。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欧盟正式取代欧共体。同时,欧盟持续扩大,吸收了一批中立国和东欧国家,包括奥地利、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但英国于2020年脱离欧盟。随着经济层面的合作持续深化,欧盟的一体化建设逐步向外交、安全、司法、内务等领域拓展,它发展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国家。然而,欧盟也面临着一些深刻的内部矛盾和问题,包括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和公民对欧盟的认同问题、一体化进程中国家与超国家之间的矛盾、欧洲成员国之间、机构和成员国之间利益纷争、欧盟成员国及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长期失衡等。

第六,“殖民区域”的痕迹继续存在。首先需要提到的,即上文涉及的英联邦。其包括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的主权国家和附属国,由英国国王担任英联邦元首及一些英联邦王国的国家元首。英联邦不设权力机构,各主权国家均自愿加入,也可随时退出。英联邦成员国可以享受与英国的特殊贸易措施,成员国也可以在金融、国防、教育、技术、科研、法律等领域展开合作。英联邦国民有权移居英国,居住在英国的英联邦公民至今仍享有某些选举特权。另一个类似组织是法兰西共同体,是1959年由法国与原法属非洲殖民地国家建立的特殊组织,其成员国在对外政策、国防、货币、战略物资政策等领域开展合作。1970年改组为法语国家组织,成员国扩大到加拿大、越南等国。还有两个与法国有关的纯粹的经济区域组织是非洲法郎区。其中一个在西非经济货币联盟(1994)内,其非洲法郎(FCFA)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另一个在中非货币区(1972),其非洲法郎为“中非金融合作法郎”。

第七,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发展并行。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认为,“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的物质基础,尤其是超级大国的缺位以及世界性大国和区域性强国的崛起,预示着国际秩序的区域化倾向”^{[41]265}。二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逐渐衰落及其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日趋弱化,发达国家日益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其突出表现是世贸组织于2001年发起的名为“多哈回合”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失败。多哈回合谈判的宗旨是促进世贸组织成员削减贸易壁垒,通过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特别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然而,有关谈判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关税削减幅度及市场准入规则上存在根本性分歧而陷入僵局,于2006年7月正式终止。多哈回合谈判的终止凸显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深层危机,从内部看包括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受到侵蚀、缺乏较强的约束机制、决策机制与程序缺乏民主和透明度,而外部的挑战之一就是区域主义的发展,因为区域主义的发展使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受到损害、增加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潜在成本、造成贸易转移问题及使区域贸易谈判占用了大量的谈判资源^{[48]45-47}。因此,多边贸易体制的危机与区域主义的发展相互推动。

三、结 论

综上所述,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区域的内涵及其与国别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很明显,帝国的兴起及其推动的经济文化交往和文明变迁为区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证明了人文因素在塑造区域方面发挥了与地理因素至少同等重要的作用。而近代以来,区域与国别的这种复杂关系逐渐清晰化和稳

定化,这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和大航海运动开启之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扩张而逐步实现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从欧洲发展为整个世界的通行国家模式,国际法的制定、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和联合国的建立为现行国际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从当代国际政治的演变中依然可以窥见传统区域的痕迹,如“乌玛”概念对伊斯兰国家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影响。二战后,全球化与区域主义并行不悖,而近年来双方关系的变动不居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生动注解。

参考文献

- [1] HURRELL A. 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4): 331-358.
- [2] NYE J. Patterns and Catalyst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65(4): 870-884.
- [3] RUSSETT B.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M].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 , 1967.
- [4] DEUTSCH K, BURRELL S, KANN R.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5] GILBERT A. The New Regional Geography in English and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8(12):208-228.
- [6] BUZAN B. How Regions were made, and the legacies for World Politics: an English School Reconnaissance[A]//T. V. Pau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7] KISSINGER H. The New World Order[A]//Chester A. Crocker and Fen Osler Hampson, *Managing Global Chaos: Sources of and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6.
- [8] PAGE S. *Regionalism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 [9] RIUKULEHTO S. Various Directions in Regional History[J]. *New Contree*, 2015(74):112-128.
- [10] 王逸舟. “区域”范畴的扩展[J]. 南大区域国别研究, 2024(2):3-5.
- [11] 谭萌. 海外研究的“区域”知识谱系及其变迁[J]. 世界民族, 2024(5):31-43.
- [12] 王启龙. 区域国别学十问[J]. 外语教学, 2023(2):10-17.
- [13] 赵裴, 姜锋. 试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主体与客体[J]. 外语电化教学, 2024(4):3-10, 101.
- [14] 汪晖. 作为时空体的区域[J]. 学海, 2022(2):26-33.
- [15] 李优, 张宇权. “区域”概念的形成与合法性问题: 基于分类框架的比较[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4):48-59.
- [16] 王在亮, 高英彤. 国际政治学中“区域”概念重构及现实考量[J]. 太平洋学报, 2013(1):20-31.
- [17] 程美宝. 国别思维与区域视角[J]. 史学理论研究, 2022(2):18-26.
- [18] 巴里·布赞, 理查德·利特尔.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M]. 刘德斌, 主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19] 郑冬子, 陈慧琳. 地理学区域概念的哲学思考[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9(4):27-30.
- [20] 羽田正. 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M]. 朱莉丽, 刘丽娇,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21] 张杨. 美国区域研究的知识体系与代际差异[N]. 光明日报, 2024-01-29(14).
- [22] KUBIK J. How to Think about ‘area’ in Area Studies? [A]//Zoran Milutinovic. *The Rebirth of Area Studies Challenges for Histor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I. B. Tauris, 2020.
- [23] 黄民兴. 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24] 莫怀平. 古希腊殖民地: 城邦制在海外的复制[J].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 1994(1):38-43.
- [25] 马新. 东西方不同文明之路有何基因差异? [EB/OL]. 中国新闻网, 2023-12-09, https://history.sohu.com/a/742778550_123753.
- [26] 马新. 龙山时期家户结构与社会组织形态试探[J]. 文史哲, 2023(4): 5-16, 165.
- [27] 黄民兴. 关于上古中东帝国的几个问题[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4):35-39.

- [28] 雷恒军.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转型——从有限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过渡[J].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3):1-6.
- [29] 谢维扬. 先秦时期中原周边地区国家化进程的三种模式(上)[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3): 48-55.
- [30] 黄民兴. 文明对话:希腊化时期西亚北非历史的个案[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7(6):70-74.
- [31] BEN-DOR G. State and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Emergence of the Post Colonial State[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3.
- [32] 巴里·布赞,阿米塔·阿查亚. 重新想象国际关系学:三种非西方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M]. 李东琪, 颜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5.
- [33] LAPIDUS IRA M. Islamic Societi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34] 何顺果. 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35] 吕振纲. 曼陀罗体系:古代东南亚的地区秩序研究[J]. 太平洋学报, 2017(8):27-39.
- [36] 宁骚. 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37] 杰弗里·萨克斯. 全球化简史[M]. 王清辉,赵敏君,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
- [38] 朱和海. “中东”的由来、性质、使用和内涵等问题考[J]. 西亚非洲, 2014(3):147-160.
- [39] 徐步. “东方”与“西方”概念缘起及演变[EB/OL]. 国际合作中心网, 2022-06-07, <https://www.icec.org.cn/publications/theories/19.html>.
- [40] 华勒斯坦等.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 刘锋,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41] 巴里·布赞,乔治·劳森. 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M]. 崔顺姬,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42] 阿道夫·希特勒. 我的奋斗[M]. 王诚,译. 新加坡:南洋出版社, 2016.
- [43] 黄民兴, 汪志远. 凡尔赛-色佛尔体系的建立和维护——1915—1945年英法殖民主义与中东民族主义的博弈[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4):47-64.
- [44] TAGORE R. Nationalism[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7.
- [45] 杨烨,王静. 中欧概念演变与地缘政治变迁[A]//杨烨,高歌. 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的关系,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46] 安维华. 美国“大中东”战略与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J]. 中东研究, 2004(1):7-12.
- [47] 黄民兴, 陈利宽. 阿富汗与“一带一路”建设:地区多元竞争下的选择[J]. 西亚非洲, 2016(2):16-31.
- [48] 邓炜. 从“多哈回合”中看多边贸易体制的危机[J]. 经济经纬, 2007(1):44-47.

[责任编辑 樊丹丹]

On the 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HUANG Min-xing, WU Yue

(School of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some basic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region”. The main body of the paper divid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stages of the concept of “region” and analy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These stages include: the era of ancient tribes and tribal alliances, which were “tribal regions” without a state; the city-state era, which refers to the “cultural economic region” where small countries abounded; the era of limited monarchy with diverse civilizations, where regions and countries overlapped; the era of centralized monarchy with unified civilization, namely the formation of “civilized regions”; the regional era dominated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lonial powers, namely the formation of “colonial regions” (colonial empires); the era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characterized by the struggle between colonial “regions” and independent “regions”; the era of Cold War, characterized by a “regional” opposition between different ideologies; the post Cold War era, referring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g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ups and downs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region; the world; historical evolution